

行政管理重点学科丛书

公共治理结构中 的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社会防卫的治理

甘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公共治理结构中 的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社会防卫的治理

甘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基于社会防卫的治理/甘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

(行政管理重点学科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2685 - 8

I. ①公… II. ①甘… III. ①企业责任 - 社会责任 - 研究 IV. ①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6943号

书 名: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基于社会防卫的治理

著作责任者:甘峰著

策划编辑:杨丽明

责任编辑:朱彦 杨丽明 王业龙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22685 - 8/F · 364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la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9印张 273千字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方法	(1)
二、现有模式批判	(2)
三、政府转型与“社会防卫”	(3)
四、公司民主化规制与“社会经济人”转型	(5)
五、协同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	(6)

第一篇 公司行为的方法论探析

第一章 公司目标与行为的伦理诠释	
——相关文献综述	(11)
一、从伦理学起步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11)
二、公司目标的机会主义危害与社会成本	(14)
三、公司社会责任的多重视角	(17)
四、跨国公司与环境	(21)
五、公司批判	(25)
第二章 经济学的道德科学回归	(31)
一、在道德哲学中生成的经济学	(31)
二、方法论体系改变：“效率优先”的经济学范式	(34)
三、效率优先——剥离了价值判断的方法论体系	(38)
四、从“效率优先”到“次贷”危机	(42)
五、效率、公正与自由	(47)

第二篇 模式批判

第三章 战时体制延续下的日本公司经营模式	(51)
一、公司是“共同体”吗?	(51)
二、企业工会:公司立场还是员工立场?	(56)
三、“法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日本式经营	(59)
四、日本式经营的权力结构与无责任制	(64)
五、公司危机与“经营者时代”的终结	(66)
第四章 日本“公司中心型”经济社会模式	(69)
一、分析框架:政治家、官僚、公司的三位一体结构	(69)
二、具有分配功能的选举制度	(70)
三、政治与企业	(74)
四、官僚与企业	(78)
五、土地法人化批判	(83)
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与“企业化政府”模式	(87)
一、公司政治战略	(87)
二、资本积累危机与新自由主义	(90)
三、“企业化政府”的市场逻辑	(94)
四、“企业化政府”实践——西方行政改革	(97)
五、改革与社会危机	(101)
六、“企业化政府”没有改善财政状况	(104)

第三篇 政府转型与“社会防卫”

第六章 发展——从“经济增长型”到“社会防卫型”	(111)
一、发展——市民社会内发的过程	(111)
二、从内发式发展到外发式发展——“经济增长型”社会形成 ..	(115)
三、转型中的“社会防卫型”治理模式	(118)
四、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增长型政府”	(121)

五、“社会防卫型政府”建构	(128)
第七章 美国政府的社会性规制	(131)
一、企业社会性规制的起源	(131)
二、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社会政策目标	(135)
三、“奥巴马新政”与“罗斯福新政”的比较	(143)
第八章 欧洲统一与社会的欧洲	(150)
一、“社会的欧洲”历史进程	(151)
二、欧洲制宪危机的社会原因	(156)
三、《欧盟社会宪章》的意义	(160)
四、民主、社会与地域的欧洲	(163)
第九章 规制改革：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166)
一、重新审视规制改革理论	(166)
二、规制改革机制：受生产者驱动还是消费者驱动？	(173)
三、反托拉斯与政府垄断	(175)
四、消费者主权与消费者代表体系	(177)
第四篇 公司民主化规制与“社会经济人”转型	
第十章 复杂系统中的地球环境与经济活动	(185)
一、动力源的历史演进：从风力到石油	(185)
二、“废热·废物”增大法则	(189)
三、水与土——“废热·废物”的出口	(191)
四、农业与工业：“废热·废物”的出口与进口	(193)
五、文明社会的“废热·废物”	(195)
第十一章 变化中的公司与社会	
——公司与利益相关者	(204)
一、公司治理结构变化	(204)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207)
三、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利益相关者	(210)

四、欧盟公司治理中的的社会责任	(213)
五、全球化趋势下的利益相关者——社会功能弱化	(219)
六、中国：“利益相关者”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226)
第十二章 公司民主化规制与社会责任	(229)
一、公司与社会冲突：合法性与正当性	(229)
二、怎样的公司可以称做具有社会责任的公司	(232)
三、公司民主化规制的宏观调控与微观建构	(238)
四、公司民主化规制的测量与评估	(244)
 第五篇 政府、企业与社会：协同治理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第十三章 社会企业——协同治理新范式	(255)
一、社会企业：起源、含义、目标及趋势	(255)
二、社会企业类型	(259)
三、以投资改变社会——社会责任投资(SRI)	(262)
四、中国社会责任投资滞后的原因与对策	(267)
第十四章 市民的“公共”：公共部门民营化的公共性缺失与回归 ——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质疑	(273)
一、“行政外包”下的“公共”——民主导还是官支配？	(273)
二、官制市场——被弱化的公共性	(277)
三、市民的“公共”——提案型市民运动	(282)
四、“大公共”视野：从“官制市场”到“市民市场”	(286)
 参考文献	(293)
 后 记	(298)

导 论

一、研究方法

理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建立研究的形式和方法。无数的制度形成了不同的公司行为方式,每一种公司行为方式都有其自身的激励和动力机制,从而形成不同的研究形式和方法。

“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在重复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改革,而是基于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以“效率优先”为特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防止市场侵入的“社会防卫”治理模式。

“效率优先”的方法论体系把企业的激励机制引入政府治理。作为“企业化政府”的治理,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效益。然而,“效率优先”的治理模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问题是:判别公司的行为方式,究竟以价值判断的尺度衡量,还是以“效率优先”的标准测量?这涉及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经济学是道德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第一篇正是从这一点切入,在对公司行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经济学属性与方法论体系。

毋庸置疑,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体系以道德哲学为基础,他提出的“私利”是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利己的经济行为,其视野中的市场秩序是以维护社会文明与法的正义为基础的。

然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对上述经济学的正统学派提出了挑战——经济学研究的是“实现有效率的资源分配”,而全面阐述“效率优先”方法论体系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效率优先”方法论体系

实际上把价值判断剥离了经济学体系,从而把经济学引向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的领域。

在这里,笔者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

本书基于跨学科的研究空间,在五篇十四章的结构体系中,以比较的手法展开批判的视角,在一个纵向全球化进程、横向国际化体系中,展现一个全新的研究形式与方法。在这里,笔者不可能打破主流思想,但是在探索范式的变化。

二、现有模式批判

在对方法论探索的基础上,第二篇的三章对现有的、为世人所推崇的公司模式以及由公司引领的经济社会形态和政府管理模式进行批判。这里包括:第三章“战时体制延续下的日本公司经营模式”;第四章“日本‘公司中心型’经济社会模式”以及第五章“新自由主义与‘企业化政府’模式”。

在大学管理专业的教学中,一直以日本式经营的“共同体”模式作为经验借鉴,并认为日本式经营是最优秀的管理方式之一。然而,笔者认为,由日本式经营的三大支柱,即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工资制和工会组织所构成的“共同体”模式是日本战时体制——“40年体制”在战后的延续,是从“国家主义”向“公司主义”转换中的经营模式。东京电力核事故至今还在持续,根本原因在于“公司主义”的经营体制。

由公司模式引领,“东亚奇迹”推出一个政府模式,这个模式就在日本。具体地说,是“公司中心型”经济社会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社会合理性服从于经济合理性,也就是让社会服从于公司的经济合理性。可是,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公司中心型”经济社会模式并没有让日本经济再度复苏,而是呈持续低迷趋势。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领域逐渐显现出它的影响力:其一,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其二,与经济自由主义

互为因果的政治结构——企业化政府。

“企业化政府”以“企业支配模式”处理公司、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里根改革、克林顿改革到布什改革,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思路。然而,改革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中产阶层消失、两极分化重现……规制改革以削减财政支出为目标,然而并没有改善财政状况。如高举“小政府”改革旗帜的美国与日本,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三、政府转型与“社会防卫”

经济学是道德科学,以此为原点,本书重新审视政府与公司的关系。与新公共管理不同,本书展现的是“社会防卫”的治理。

“社会防卫”的治理中,权力动机、营利动机和权利动机之间如何保持均衡博弈,这是本书的一个切入点。我们看到,在政治家、官僚与公司的三元结构中,政治家一般居于强势,因为政治家是政策的制定者,官员是政策的执行者。可是,政治家的政治资金从公司获得,所以强势的政治家在公司面前却表现为弱势。但是,官僚在公司面前却呈强势,因为对市场的干预主要由官员完成。

同样,在官商结合的二元结构中,通过官商一体、政商结盟垄断经营。官员制定规制,引导市场走势,所以政府显得强势。然而,政府税收通过公司赢利获得,对于公司监管显得力不从心。在这里,政府又处于弱势。

今天的时代,市场经济“空间”呈不断扩大态势,而这“空间”里的“市场原理”被无限地深化。这是市场经济的两种倾向,即“市场经济扩大与市场原理深化”,被称做“市场经济化”(或“市场主义”)。

“市场经济化”在四个层次不断向前推进:第一,全球化,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增大;第二,区域统合,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等,这是区域层面的“市场经济化”;第三,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如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等;第四,西方国家规制改革,在民营化、规制撤销或放松的改革中强化市场化原理。无可争辩的是,以跨国公司为首的赢利企业是“市场主义化”推进主体。

匈牙利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沿着19世纪世界史的文脉,对市场与社会关系作出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在近代市场社会,社会是市场的原点,市场是社会的一部分。可是,市场却向社会对立面转变。例如,土地、货币与劳动力原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而现在却作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如果这一趋势不断加剧,必然引起自然与人类的冲突,最终导致市场社会解体。所以,对于土地、货币与劳动力的过度商品化或者过度“市场经济化”,社会方面发起“社会防卫”运动。卡尔·波兰尼把市场调整的无秩序膨胀与社会防卫称为“二重运动”。

然而,建立在“二重运动”基础上的19世纪文明正在走向崩溃。新自由主义的西方规制改革中,“市场经济化”推动下的国民福利分配,以及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公司社会责任的竞争性需求。所以,重新审视政府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显得尤其重要。

第三篇围绕政府转型与“社会防卫”展开。第六章以“发展”为视角,从内发式发展与外发式发展的结构框架中探求发展的起源、变迁以及转型。本章对“经济增长型”社会的形成进行了正反两方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政府转型与“社会防卫”治理模式。

“社会防卫”治理模式需要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保护经济和社会目标。第七章通过美国政府社会性规制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民意和利益代表机制,以及政府政策的组合能力。这一章的亮点是“罗斯福新政”与“奥巴马新政”的比较。在“福特主义”时代,对于资本的社会调整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时代。“奥巴马新政”的“社会防卫”正在面临巨大挑战。

第八章“欧洲统一与社会的欧洲”揭示了欧洲统一进程中的“政府—社会—公司”的良性互动,以及一体化政策的公平、公正及其人道。欧洲统一进程中的“社会防卫”在“社会统一”的进程中表现出巨大的活力。

第九章回到了“生产者优先”与“消费者主权”这一颇有争议的论点,围绕美、日、中三国在改革机制、政府垄断、消费者代表体系等方面的规制改革进行比较。本章指出,社会性规制无疑是政府引导企业行为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那么,规制改革是为生产者还是为消费者?在一个外资依存度

高的国家，“社会防卫”尤其需要政府的政策组合能力。

四、公司民主化规制与“社会经济人”转型

从“经济人”到“社会经济人”，这是一个革命性转变，而公司民主化规制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制度安排。

今天，公司持有无限制的权力，并且永远以“法”的姿态强化其权力。公司有关生产、雇用以及投资的决策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可是公众却没有发言权。尤其当公司在环境污染、人权保障以及公共安全等方面作出了错误决策之后，受害的是消费者与雇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司基本上是一套不民主的制度。所以，公司民主化规制旨在公司利润与社会福利之间建立一套民主程序，促使企业从“经济人”向“社会经济人”转变。

第四篇第十章把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在一个复杂的地球环境中加以考虑。本章指出，从风力到石油转换，在人类生产活动与能源的关联中表现出一种让人类难以接受的姿态——“废热·废物、水、土之间的平衡逐渐被打破，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水资源匮乏……而这一系列状况又与不断反复的干旱、洪涝形成恶性循环，现代工业文明造就了一个环境破坏型经济结构。”²⁰ 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曾经指出：所谓“财富”不过是对自然的负债而已，一种负债的“财富”不过是一种幻影，“财富”应该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自然不能负债，向自然索取的应该归还。^①

第十一章对“社会经济人”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司治理模式的转换、经营管理阶层的兴起，围绕公司治理的论战悄然而至：经营管理阶层应该忠诚于公司的价值利益还是相互信赖的利益相关者？本章以德国公司治理为经验，以公司与社区的关系为框架，在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中，探讨利益相关者在中国公司治理中的地位。本章指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应该从事有助于改善社会的事情，建立

① [日]室田武：「君はエントロピーをみたか」，朝日文庫1991年，第168頁。

一个与自然和谐的,符合市场伦理的,具有承诺、约束、责任感和自制力的企业。

第十二章探讨了公司民主化规制的治理结构。对大企业的民主化规制,不仅仅涉及商品、价格、服务以及品质等一系列市场评价标准,还要追究其生产过程,即公司在怎样的经营体制下生产,以及其生产过程是否符合具有社会责任的公司标准。为此,在宏观层面,把公司纳入社会责任规制体系,包括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评价机构、经营者网络以及以 NPO 为核心的市民运动,由此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监督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在微观层面,公司民主化规制由一系列指标构成,在公司民主化管理、环境革新与道德管理等方面,社会责任应该成为企业经营的中心问题,并作为经济重大课题被纳入公司决策过程。

五、协同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

人重新回到社会核心的地位,这就是“人的发展”。公共治理结构中的公司社会责任以“人的发展”为前提,通过政府、公司以及市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达到新的均衡,从而使企业重新回到社会原点。

第十三章从“社会企业”的角度阐述协同治理。社会企业源自 19 世纪的欧洲,它是在国家权力之外,由市民将个体人力资本通过社会协同,提高其社会效能,促进社会发展。今天的“社会企业”,我们更关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投资方法改变社会”——社会责任投资成为公司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新范式。我国社会责任投资滞后,而宏观层面的社会责任推进制度缺失是问题的关键。对于产业政策基础,社会责任投资(CSR)应该被置于怎样的位置?与社会责任投资相关的各个部门如何寻求政策层面的改革?对于上述问题,至今尚未形成指导性意见。

第十四章对新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提出质疑。本章对日本公共部门民营化改革与上海公共部门改革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官制市场”与“市民市场”两个概念。本章认为,新公共管理推进下的公共部门民营化,实际上把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引入一个“官制市场”。上海公共部

门改革、BOT模式的运用,把赢利的基础设施项目推向市场,吸引外商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建设。可是,改革基本按照“官制市场”的思路运行。

本书从“市民的公共”——一个“大公共”视野中提出公共部门改革的两大转变:其一,从“官制市场”向“市民市场”转变;其二,从“批判型市民运动”向“政策提案型市民运动”转变。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公司以及市民社会协同治理下的社会责任。

第一篇 公司行为的方法论探析

公司——概念化的“公司”与现实世界中的公司是不同的。作为概念化的“公司”，它来自家族式企业。经过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百多年，美国实现了由家族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演变。我国2005年制定《公司法》，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出现比美国晚了约一百五十年。

公司属经济学研究范畴，公司社会责任是跨学科研究，公司社会责任中涉及的公平、正义已经进入了政治学研究领域。然而，不管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它们都是从伦理学起步，近代经济社会秩序是由经济规律与政治规制构成的。

公司行为是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公司行为的不同评价涉及经济学属性与方法论体系。作为跨学科研究，首先要建立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形式和方法，而这又必须区别于已有的研究成果。

经济学是自然科学还是道德科学？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释形成了完全不同质的方法论体系。从古典经济学到福利经济学，一个基本范式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把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经济制度。然而，“效率优先”的研究范式对上述学派提出挑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福利经济学方法论中存在基本缺陷，所以研究方法要改变。

企业是追求利润的资本运动体，又是社会生产的承担者。社会对企业伦理寄予无限的期待，可是企业实态与社会期待却有很大的背离。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只用经济术语和所谓的权威观点评价公司组织，因为公司组织要负责帮助社会实现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目标。公司行为是否符合市场和社会道德规范？第一篇的第一章与第二章正是从这一点切入，在对公司目标与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探索。

